

李 帆 / 著

LIUSHIPEI YU ZHONGXI
HU



刘师培 与

中西学术

以其中西交融之学和学术史研究为核心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刘师培与中西学术

——以其中西交融之学和学术史研究为核心

李 帆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刘师培与中西学术：以其中西交融之学和学术史研究
为核心/李帆著.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3
ISBN 7-303-06414-1

I. 刘… II. 李… III. 刘师培 (1886~1919) -
人物研究 IV.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11277 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出版人:常汝吉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90mm×1 240mm 1/32 印张:9.75 字数:234 千字
2003 年 3 月第 1 版 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定价:15.00 元

序一

近代中国知识界，刘师培可算得是有特色的人物。他12岁已读完《四书》、《五经》；19岁中举人；20岁会试落第，至上海，先后结识章太炎、蔡元培、章士钊、陈独秀、谢无量等人，遂投身于革命潮流，并与林獬合撰《中国民约精义》一书；21岁先后参加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光复会；22岁加入“国学保存会”，并成为其机关刊物《国粹学报》的主要撰稿人；24岁携妻何震等东渡日本，面见孙中山，即正式加入同盟会，并成为《民报》撰稿人，随后参与章太炎等人罢免孙中山的同盟会总理职务的活动，此外还创办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天义报》，发起组织“社会主义讲习会”，（1907年）12月由日本回上海，向两江总督端方自首；25岁与何震再赴日本东京，《天义报》停刊，另创办的《衡报》亦于是年（1908年）10月被日本政府查禁，随后与何震自日本返上海，向端方密报江浙革命党人谋武装起事；26岁去南京公开投靠端方；28岁随端方入川，端方为哗变湖北新军所杀，刘为四川军政府资州军政分府拘留；29岁获释后，在成都四川国学院任教；30岁离成都赴上海，后至太原，出任阎锡山都督府顾问；31岁离太原赴北京，任袁世凯公府谘议；32岁与杨度等人发起“筹安会”，发表宣言，鼓吹帝制，后筹安会改组为“宪政协进会”，出任参政院参政，被袁世凯封为上大夫；34岁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国文学”、“中国古代文学史”课，其间还在国文研究所担任经学、史传、中世文学史、诸子四个研究科目；36岁与黄侃任《国故》月刊社总编辑，“以图挽救”“国学沦夷”，是时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11月因病去世。

从刘师培的简历可以看出，在他短短的一生中，思想杂而多变。16岁时“以绍述先业、昌扬扬州学派自任”，19岁得中举人，20岁会试落第，到上海后遂投身于革命潮流，思想变化迅速。1907年刘师

培（24岁）的活动情况，很能表现出他的思想杂而多变。这一年，刘师培于2月到东京与孙中山晤面后正式加入同盟会，3月即参与章太炎等人的“倒孙”活动，12月回上海后向端方自首，背叛革命；他一方面不断在《国粹学报》上发表国学研究的文章，另一方面创办《天义报》，组织社会主义讲习会，宣扬无政府主义。刘师培在政治上显然是糟糕的，但在学术上却很有成就。他的思想变化很快，时而鼓吹反满革命，宣传“民约”思想，时而崇无政府主义，不过有一点始终没变的是“国学”。他承家学所传，十几岁即以“昌扬扬州学派自任”，1905年《国粹学报》创刊后，在该刊连续不断发表有关国学研究的文章。即使在1907年至1908年他在日本创办《天义报》、《衡报》，发表宣扬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时，也仍然在《国粹学报》上发表有关国学的文章。实际上，他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不仅是在日本受西方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而且是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西学与中学的融会。这构成他的无政府主义的一个特点，有别于巴黎《新世纪》的吴稚晖等人的激烈否定传统。民国后，刘师培的研究和教学离不开经学、古代文学等国学内容。因此，对刘师培的研究，重点在其学术，难点也在学术。

李帆同志的《刘师培与中西学术》，正是着重从学术的角度来研究刘师培。刘师培生于经学世家，自幼承传家学，少年时即“以绍述先业、昌扬扬州学派自任”，研究刘师培的学术，自然首先要探讨他对家学和“扬州学派”的继承问题，本书即以此为开端。书中认为刘师培的著述涉及方面甚多，其“学术规模和治学特色可谓深得‘扬州学派’之精髓，即长于会通，兼容并包。”如治经虽偏重古文，但不排斥今文经说，二家经说可并行不悖；对宋明人之经说也不存门户之见，主张“荟萃汉、宋之说”，反对“并有宋一代之学术而废之”。一代有一代的学术，刘师培从事学术研究的晚清毕竟不同于乾嘉年间，因而他的学术研究不能不受时代的影响，带有时代的特色。刘师培学术的时代特色，即是中西交融之学。

在清末从事学术活动的刘师培，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吸纳西学以建构其中西交融之学。为了具体说明刘师培所受西学的影响，书中专

立“刘师培所见西书考”一节，详细地考析了刘师培所读过（或征引过）的西书和所接触过的西方、日本的学者、思想家，并列表予以表明。这一具有原创性的工作，体现了作者治学的扎实。正是基于对刘师培的中学、西学的学识有具体、深入的了解，才能准确把握他的中西交融之学的特点。书中以刘师培与严复相比较，认为刘师培的吸纳西学，是基于中学，借西学佐证中学，多有比附；而严复虽也有比附之处，但他是站在西学的立场上把握中学，以西学为坐标来评判中学，其目的在于学习西方，改造中学，使中学现代化。在中国古典学术向现代的转型中，指出这种不同是有意义的。即如刘师培对中国学术史的研究，也是通过中西学类比，来评估中国古典学术之得失。书中关于刘师培对先秦、汉宋学术的独到见解，对清学的别具一格的创获的论析，多有新意。

李帆同志治学扎实严谨，注意从第一手资料入手，在基础性的研究工作上用力，这在书中所附“年谱”可见其所下功夫。本书的正文是在“年谱”的基础上撰写的。

刘师培是一位对国学深有造诣的学者，又是参与政治活动、有其政治思想的人物。1903年到1908年，他发表了大量研究国学的著述，其中有一些与宣传反清革命、无政府主义有关。时代潮流以及他的政治立场、观点，不能不影响其国学研究。因此，研究刘师培的学术，不可能完全与政治分离，作“纯学术”的评析。只有将二者结合，实事求是地探究，才能更合乎实际地评析其学术。近代中国学者，类于此者不是个别的，作为研究方法，当有广泛意义。

龚书铎

2002年7月

序二

李帆同志原为辽宁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1996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博士点，随我研读博士学位。1999年毕业，转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后流动站，随龚书铎教授从事研究工作，出站后便留在该系任教。2002年曾应德国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汉学系之邀请，前往该校讲学。李帆自研读博士之日起，即以“晚清学术史”为研究课题。一年前，他把博士阶段的研究成果《刘师培与中西学术——以其中西交融之学和学术史研究为核心》改写成一本专著，交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他要我在这本书前面写几句话。这，我是义不容辞而又十分高兴的，正好借这个机会，谈谈我对刘师培学术思想研究和李帆此书的一些认识。文中不当之处，希望得到同行专家或读者的指正。

大家知道，刘师培的学术思想，基本上是一种“不中不西，又中又西；不新不旧，又新又旧”的思想，或者说，是一种“混合型”、“过渡型”、“转型型”的学术思想，不折不扣地是晚清中西文化“交融互释”的产物。这种“过渡”形态的思想文化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学科转型——即由经、史、子、集“四部”之学转变为文、理、法、商、工、农、医“七科”之学——的过程中，影响更为显著。关于这一点，钱玄同先生1937年在《刘申叔先生遗书序》等文章中曾经这样论述：“最近五十余年来为中国学术思想之革新时代。其中对于国故研究之新运动，进步最速，贡献最多，影响于社会政治思想文化者亦最巨”。在他看来，这一运动中有十二位贡献“最为卓特”的学者，他们是：康有为、宋衡、谭嗣同、梁启超、严复、夏曾佑、章太炎、孙诒让、蔡元培、王国维、崔适和刘师培。对刘师培，钱玄同先生的评语是：“此黎明运动中之刘君，家传朴学，奕世载德，蕴蓄既富，思力又锐”，“年齿最稚”，而

且，“刘君识见之新颖与夫思想之超卓，即在民国纪元以前二十余年间有新思想之国学诸彦中，亦有甚高之地位。”他特别重视刘师培在学科转型方面所做的贡献，对刘氏编撰的几种新式教科书，如《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国地理教科书》、《中国文学教科书》、《伦理教科书》等，给予很高评价，认为其中“甚多新义”，不愧是吸纳西学的“典范”。总之，刘师培学术思想之“新”，在当时学人中是得到普遍公认的。

但是，近年来，有关刘师培学术思想的研究存在着“三多三少”的现象，即：（一）研究他的“历史问题”的文章多，研究他的生平事迹的文章少；（二）研究他的政治思想尤其是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文章多，研究他的学术思想的文章少；（三）在学术思想方面，研究他对中国历史文化见解的文章多，研究他与“西学”关系的文章少。似乎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前辈学人重视的问题，后代学人却“不屑一顾”。当然，根本原因不在于学术界，而在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但是，作为学人，从文化上着眼，由衷地希望看到状况有所改变。如今，李帆的书给我们带来了兴奋和希望。书中不仅全面地论述了刘师培的学术思想，而且还有一个专章——第二章，专门论述刘师培与“西学”的关系。从《国粹学报》创刊以前谈起，一直谈到这份刊物本身。又，书中特别重视刘师培、严复二人与“西学”的关系。最后又将种种分析结果列成专表，特别列举刘氏文章中引用的“西书”名称及作者姓名，一共有“西书”三十多种，人名六十余个。以《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一文为例，此文中引用了松平康国的《世界近世史》、马恩西的《泰西新史揽要》、艾约瑟的《希腊志略》、那特经的《政治学》、甄克思的《社会通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和《社会学原理》、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等八种。在分析了各种“西书”对刘师培思想的影响之后，又进一步对刘氏此时之所以热衷于吸纳“西学”的种种原因，做了考察。作者认为，首当其冲的是“救亡”必先“兴学”的观念——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观念。文中又指出：中国首先是作为文化集合体的“天下”而存在的，因此，文化存亡就成为民族兴衰的“首要因素”。正因为如此，作为“文化承担者”的知识分

子应及时地把兴学的责任肩负起来，若不如此，国家兴亡就很难进一步设想了。而要兴学，最重要的事便是“借助于西学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使之与中国固有的学术相激相荡，相融相合”，这样，才能有效地激发“国学”的生命力，使之一天天旺盛起来。这样，“兴学”才有着落，“救亡”的目的才能达到。这样的分析是比较深入的，它使读者既认识了刘师培与“西学”的关系，又明白了刘氏之所以急于吸纳“西学”的种种思想因素，使读者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书中还有一些分析，如“西学”传播与废科举、兴学校的关系等等，俱都中肯恰当，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总之，此书史料上有新的开掘，论述上有新的见解，因而使研究工作向前推进一步，是一本有益于学术的好书，故乐而序之如上。

刘桂生

2002年12月

目 录

序一	(1)
序二	(4)
绪论	(1)
一、缘起	(1)
二、研究状况的回顾与思考	(3)
三、本书的研讨思路	(17)
第一章 先贤学术与刘师培	(24)
第一节 “扬州学派”的基本精神	(24)
一、何谓“扬州学派”?	(24)
二、“扬州学派”的成就与特色	(30)
第二节 仪征刘氏家学	(33)
一、学术建树	(33)
二、学术风格与特色	(36)
第三节 刘师培对先贤学术的继承与超越	(39)
一、对先贤学术之继承 (1): 国学成就	(39)
二、对先贤学术之继承 (2): 治学特色与学术大势	(44)
三、清末的学术新潮流	(47)
四、对先贤学术之超越	(51)
第二章 刘师培的中西交融之学	(59)
第一节 刘师培关注并接受西学之缘由	(59)
一、救亡与教学	(59)
二、扬州地域特点与考据学的先天优势	(61)
三、废科举、兴学堂的制度变迁	(63)

第二节 刘师培所见西书考	(66)
一、前《国粹学报》时期对西学的吸纳	(67)
二、《国粹学报》创办后对西学的吸纳	(72)
三、所见西书的综合分析	(83)
第三节 以西释中：刘师培之“新学”	(90)
一、阐释中学：交融中西的起点与终点	(90)
二、社会学新知与小学旧统	(91)
三、历史学的新视野	(97)
四、名学与义理	(101)
五、进化论与小学：“新学”之纽带	(103)
第四节 对刘师培交融中西学术的评价	(105)
一、吸纳西学的角度和程度——与严复之比较	(105)
二、对学术转型的意义	(110)
三、“好依傍”的“痼疾”	(113)
第三章 刘师培的中国学术史研究	(124)
第一节 清末民初的学术史勃兴	(124)
一、学术史勃兴的表现	(124)
二、学术史勃兴之缘由（1）：兴学以救国	(126)
三、学术史勃兴之缘由（2）：内在因素	(129)
第二节 刘师培的学术史研究实绩	(131)
一、学术史通论	(132)
二、论先秦学术	(135)
三、论两汉学术及汉宋学术流变	(141)
第三节 学术史个案：刘师培之清代学术史论	(148)
一、通论性著述	(149)
二、学案体著述	(156)
三、传记类著述	(160)
第四节 刘师培学术史研究之地位与特色	(163)
一、以西学评估中国古典学术	(163)
二、先秦、汉宋学术的新创见	(166)

三、解析清学：别具一格的创获·····	(170)
结语·····	(188)
附录：刘师培学谱简编·····	(192)
参考文献要目·····	(285)
后记·····	(298)

绪 论

一、缘 起

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号左龢）是清末民初著名的学者和政治人物。且不说他在政治舞台上令人瞩目的表演，仅在学术领域里能与章太炎并称“二叔”（章枚叔、刘申叔），即已表明他在时人心目中的地位。不过在后人眼里，两人却无法相提并论。这在研究者那里体现得最为明显，即与章太炎研究的繁盛兴旺相比，刘师培研究相对门庭冷落，两人的境遇大相径庭。究其根源，政治和文化两方面因素应是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

在刘师培短短 36 年的人生中，政治风暴对其冲击甚大，而他在一些政治斗争关键时刻的表现往往为人诟病，如以同盟会员之身于 1907 年底与清廷大吏端方通款，不久投入其幕中；1915 年加入“筹安会”。前者在当时的革命党人眼里自然是叛卖行为，后者也被视作助纣为虐，所以他在政治上一直是被谴责的对象。早在 1911 年夏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时发布的宣言中，人们便指责他为“客犬”（清史走狗）；陶成章的《浙案纪略》也对其行为多方责备；黄节、黄侃等人痛责其加入“筹安会”，黄节甚至耻与其在北大为伍；国民党元老冯自由、邹鲁所著史书中亦是将其作为反面典型；1949 年后，大陆出版的历史教科书和有关著作同样持此立场。也就是说，在国共两党的意识形态里，在文人学者的心目中，乃至在这种语境下接受教育的普通人眼里，刘师培都是政治上被打入另册的历史罪人。对于这样一个人物，学术界研究起来自是顾虑重重，无法深入甚至觉得没必要深入研究。这种情形以往海峡两岸皆如此。

再看文化因素。长期以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价值取向带给人们极为深远的影响，人们已习惯于认同五四的思维方式，把文化上的所谓“新”与“旧”视作截然对立，在不遗余力地宣扬“新”文化、

“新”思想、“新”道德的同时，极力贬斥“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作为四世传经的国学大师，刘师培自然是人们心目中旧的一方的代表，更何况他在新文化运动中办过《国故》月刊，被认为是与新文化相对抗。^[1]所以，一些新派学者尤其是鲁迅等人对其持反对和批评的态度。众所周知，新文化倡导者的立场一直在学界占主导地位，鲁迅等人这一态度之分量不言而喻，其对后人产生巨大影响也在情理之中，故刘师培在被批判的同时，很难引起人们学理上的研究兴趣。也就是说，刘师培既在政治上被打入另册，又在文化上被排斥或被忽略。

以上情形，加之刘师培文章古奥、学问艰深、不易索解，造成以往对其研究的相对匮乏，已有的研究成果在水平上也很难令人满意。当然，目前这种状况已有改善，但从根本上说，还无实质性的突破。鉴于此，刘师培研究仍是一个亟待加强的领域。之所以如此说，主要在于刘师培在清末民初的历史中尤其是在近代思想、学术史上占有一个独特的位置。姑不论其政治上的功过是非和宣扬无政府主义所做的大量工作，仅就其思想与学术而言，其所达到的深广度不仅独步一时，即使今天看来，某些方面仍相当深刻，仍有汲取和借鉴的必要，值得我们深入探索和研究，并在价值系统上予以阐释。可以说，作为成体系的中国近代思想、学术史，缺少刘师培这一环是不完整的。要想改进我们的思想、学术史研究，必须把这一环完整补上，而且还需在研究中纠正错讹，扫除以往因政治文化评价的偏差而蒙在这一历史人物身上的尘埃。更值得一提的是，从刘师培研究中可发掘出较大的文化意义，有益于当今的学术文化建设。因刘氏四世传经，是“扬州学派”的殿军，国学大师，但中国古典学术发展到他那里却未再沿老路走下去，而是与西学相交融，开始了学术转型，走上了现代道路。当然这非刘师培一个人的功绩，而是包括他在内的一代学者如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严复等人共同开辟的道路。他们是承前启后的一代，一端连着中国古典学术，一端连着西学新知，两端交汇，带来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显然，在这些学者中，刘师培是最不受学界重视，研究成果最少的一位。实则各人有各人的特色，不能相互代替，

也不能以整体代个案，将刘师培作为个案剖析，凸显其在这一学术转型过程中独具特色的建树，不惟使我们能清晰地了解中国现代学术建立的历程，而且对于今天处理好中西文化关系亦具有特殊意义。总之，刘师培研究尤其刘师培思想、学术之研究应受到应有的重视，并力求在今天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二、研究状况的回顾与思考

前述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对刘师培研究带来较大影响，致使该研究进行得不太充分，但并非说这方面一点成就也没有，只是相对而言其成果与刘师培所具有的历史地位不相称。实则早在民国年间，刘师培去世不久，对他的研究就已开始了。时至今日，某些领域的研究已较为成熟。

1920年，刘师培刚刚去世，日本学者小岛祐马便发表了《刘师培之学》一文，^[2]拉开了学术界探讨刘师培的序幕。从此直到40年代末，有关刘师培的论述基本停留在对其遗著进行整理和情况介绍阶段，还谈不到深入细致的学术讨论，只是开启一些研究方向。

作为第一篇系统介绍刘师培学术的文章，《刘师培之学》从刘氏生平写起，追溯了刘氏学术的渊源“扬州学派”和其家学，继而论述了刘氏的国粹主义学术活动和学术涉猎的广泛性，并重点谈了刘的经学研究成就。今天看来，这篇文章尽管粗浅，但仍有一定参考价值，如文中以较大篇幅强调的“扬州学派”学风对刘师培学术的影响和刘之学术乃“通儒之学”的提法，是相当有见地的。遗憾的是，此文反响寥寥，继起之作几无，直到1937年钱玄同编定《刘申叔先生遗书》并为之作序，^[3]才把对刘师培的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刘申叔先生遗书》（以下简称《遗书》）收入刘师培著作74种，其中论群经及小学者22种、论学术及文辞者13种、群书校释24种、诗文集4种、读书记5种、学校教本6种，除一些论无政府主义的著述及个别佚文外，可说是网罗殆尽，极大方便了学术界的刘师培研究。钱玄同为该书所作之序非常精到，成为这一时期论述刘师培的最佳著述。该序文把刘氏置于时代大环境下予以论说，认为刘氏是始于

1884年的学术思想革新时代里国故研究新运动的12位杰出代表之一，他的著述所及，主要有政治思想、论古今学术思想、论小学、论经学、校释群书等方面，这些著述“因前后见解之不同，可别为二期：癸卯至戊申（1903~1908）凡六年为前期，己酉至己未（1909~1919）凡十一年为后期。俾较言之，前期以实事求是为鹄，近于戴学，后期以竺信古义为鹄，近于惠学；又前期趋于革新，后期趋于循旧。”^[4]该文虽属概括，但影响甚大，最关键的是，文中的见解，开辟了刘师培研究的各个渠道，使后人有章可循，即可以沿着这些渠道，分门别类地深入探讨刘氏的政治思想、学术思想、学术成就等。不仅如此，钱玄同编制的《左龠年表》和《左龠著述系年》也为研究工作提供了很多方便。另外，《遗书》前所载陈钟凡、刘富曾、尹炎武、蔡元培所作之刘师培《行述》、《墓志铭》、《外传》、《事略》等文以及丁惟汾、张继、汪东、黎锦熙、南桂馨等人的序文也颇有参考价值，这些文章的共同特点是皆称许刘师培之学术造诣，说他“于学无所不窥”，“每论定一说，必旁推交通”，^[5]认为“岿然作清儒后劲者，惟余杭章太炎、蕲春黄季刚与申叔数人而已，而覃思冥悟，以申叔为最，”其学“精博无涯”。^[6]同时皆对他政治上的失节行为曲为原宥，认为是“遭时不淑，用晦而夷……卒为佞人牵引”，“非其本怀，未足以为深病也”。^[7]很显然，这些刘师培同代人的评价与看法，颇有助于后人以“了解之同情”的态度从事对他的研究。但同时亦应看到，至亲好友囿于所处位置，时有溢美之词，研究者不可不察。

《遗书》而外，这一时期关于刘师培的传记和事略之文还有一些，如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中所收的《刘师培评传》、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中所收的《刘师培》、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中所收的《仪征刘氏四世传·师培》、冯自由《革命逸史》中所收的《记刘光汉变节始末》、《刘光汉事略补述》等，除冯自由两文乃述刘氏政治活动外，其余文章皆概述刘的学术成就并予以表彰，惜述多论少，且多有重复。还有两项成果值得注意，即赵万里编《刘申叔先生著述目录》^[8]和张经麟编《刘申叔著述年表》^[9]，是研究刘师培学术与思想的基本工具，为学者提供了很多方便。

1949年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政治形势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刘师培研究在中国大陆几成空白，唯一值得介绍的是196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舜徽《清代扬州学记》一书。该书是在张氏40年代末所写《扬州学记》的基础上整理、补充、修订而成，是研究“扬州学派”的代表性著作。书中单辟“刘师培”一章，对刘氏学术和思想的主要方面如小学、经学、校勘学成就以及伦理思想、政治思想等进行了综合评介，不失为一部全面研究刘师培其人的入门佳作。该书可贵之处在于注重在刘氏学术的渊源上着墨，凸显出刘氏作为“扬州学派”殿军的地位，使人对学术传承能有清晰的认识。不过遗憾的是，全书大体停留在介绍层次，缺乏围绕问题的深度探索。

与此同时，海外学者则表现出对刘师培其人其学的较大兴趣。美国学者马丁·伯纳尔（Martin Bernal）的《刘师培与国粹运动》，^[10]可谓此一时期颇具研究深度的极少数论文之一。该文侧重探讨刘师培与国粹派的关联，认为刘氏的一生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中政治革命与文化保守主义间尖锐对立的关系，并揭示出刘氏某些思想的西方渊源，如斯宾塞、拉克伯里对他的影响，还强调了日本国粹思潮对中国国粹派形成的作用，最后指出：“正如刘师培一生所显示：文化保守主义极易演化成政治保守主义。”该文在史学界反响较大，但绝非十全十美，关键问题在于如何界定“保守主义”，以“保守主义”一词概括刘师培这样的人物是否恰当？这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

除刘师培与国粹派的关联外，海外学者最为关注的课题是刘师培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与活动，美籍华人学者郭颖颐（D. W. Y. Kwok）的《无治主义与传统思想：刘师培》^[11]即很有特色和代表性。该文就刘师培无政府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关联多方阐述，认为刘氏的无政府主义主张所尽力推崇者乃平等、平均观，对个人与自由主义未多措意；并指出，无政府主义在近代各种政治学说中是最富有“传统”倾向之思想，刘师培最终背离无政府主义，其“罪”似不应加于其原有之传统思想。值得注意的是，郭颖颐在英文正文后所附的中文摘要中，把Anarchism译为“无治主义”，而非大家习用的从日文翻译过来的“无政府主义”。“无治主义”一语是高一涵首先使用的，与中国历史实际